

從民族主義到一黨獨裁： 俄國革命的魅力

• 王 柯

摘要：中國近代史上的許多思想家和政治家，不僅大都具有留學日本或在日本從事政治活動的經驗，而且都對俄國「十月革命」之所以能夠很快取得勝利的原因發生了濃厚興趣。但是，「十月革命」吸引他們的明顯不是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的學說，而是俄國布爾什維克的「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和「以黨治國」的理念。因為他們在日本學到的是民族主義的思維，而俄國革命黨的思想則給他們提供了通過民族革命實現民族主義目標的行之有效的。本文以孫文、陳獨秀、李大釗等國共雙方的精神領袖為例，論述民族主義思想和布爾什維克主義之間的關係，並通過血緣民族主義、精英意識等特質分析近代中國何以形成一種以民族主義為基礎、但卻是一黨專政和領袖獨裁的政治生態的原因。

關鍵詞：「十月革命」 「民主集中制」 「以黨治國」 精英意識 血緣民族主義

時值2017年，許多中國人不由得再次想起了這樣一句熟悉的話語：「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但事實似乎並非如此，正如論者所說：通過李達、李漢俊和李大釗等「三李」為首的留日學生，「十月革命後，馬克思主義首先由日本傳到了中國」^①。而我們從這些早期中國共產主義思想的言論中又可以發現：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開始對中國社會發生實際影響應該是在1920年之後，而此時注意到俄國革命的，又不僅僅限於那些共產主義者。由此，歷史研究者必須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十月革命」帶給中國的究竟是馬克思主義，還是列寧的布爾什維克主義？而從近代中國接受「十月革命」影響的歷史事實中我們又可以看到，當時對俄國革命發生興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國民黨的孫文、汪精衛、戴季陶、蔣介石、廖仲愷，共產黨的陳獨秀、李大釗、李達、李漢俊、施存統等），大多具有留日或與日本政界學界交往的經歷。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中國正是通過這個群體接受了日本的近代民族國家思想。

* 本稿由2017年9月18日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和中文大學出版社主辦的講演會稿而來，誌此對關係各方致謝。

於是我們就不得不思考，對於這個群體來說，民族主義思想和布爾什維克主義之間究竟存在一種甚麼樣的關係？本文以國民黨的孫文、共產黨的李大釗和陳獨秀等精神領袖為例進行分析，以理解中國近代政治進程的性質，同時也可以讓我們從中看出近代中國政治通過怎樣的渠道消化了中國的社會文化傳統。

一 在「民族革命」旗幟下追求「民主集中制」 ——孫文的「聯俄」思想

眾所周知，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以後，能夠證明俄國對當時整個中國社會帶來了實際和重大影響的，是1923至1924兩年之間在孫文領導之下國民黨一連串「聯俄容共」的重大行動。「容共」由「聯俄」而來，據《孫中山年譜》，1921年12月間，孫文已經在桂林會見了由李大釗介紹來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Hendricus Sneevliet），馬林向孫提出了兩項建議：「組織一個能夠聯合各階層尤其是工農的政黨；建立革命的武裝核心，應先創辦軍官學校以培養革命骨幹。」^②值得注意的是，這是孫文接觸俄國布爾什維克黨人的開始，也是「以黨治國」、「以黨治軍」這一政治體制構想出現在近代中國歷史上的開端。但是事實上，直到1923年1月26日〈孫文越飛宣言〉發表之前，孫文並沒有對「聯俄」做出積極的反應。有民國學者經過考察指出：「俄之『聯』我較我之聯俄，還要積極。甚至可說，此事最初的發動者是蘇俄，而不是我們自己。」^③

事實上，孫文是在一個特殊的政治形勢下才開始嘗試接受俄國援助的。1921年5月5日孫於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後，執意北伐，希冀通過武力統一中國，因此與陳炯明發生了矛盾；1922年4月底至5月初的第一次直奉戰爭又以奉軍失敗告終，使孫文聯合張作霖、段祺瑞對抗直系軍閥的願望落空；6月，陳炯明發動了軍事政變，孫的領袖地位受到強烈的挑戰。日後汪精衛承認孫文當時採用「聯俄容共」政策是埋下了「禍根」，但又認為「從當時的環境來看，卻是一種不得不為之的事情」：「我們前後左右都被軍閥所包圍，外受帝國主義壓迫，內受分裂抗爭之苦，周邊形勢不容一點樂觀。」^④於是孫文一派想到：為甚麼中國第二、第三次革命屢屢失敗，而晚於中國革命的俄國「十月革命」能夠很快取得成功呢？

孫文指出：「中國革命六年後，俄國才有革命。……這種革命，真是徹底的成功，皆因其方法良好之故。」^⑤這個方法，就是列寧關於建設革命黨的思想：在「民主集中制」（國民黨的論述中為「民主集權制」）的原則之下，將革命政黨建設成一個以少數職業革命家為中心的有嚴謹紀律的組織，然後通過這個組織去指導革命運動。我們知道，「布爾什維克」的意思雖然是「多數派」，但事實上列寧一派在俄國社會工黨中所佔的比例卻是少數。1923年8月，孫文任命蘇聯駐廣東代表鮑羅廷（Mikhail Borodin）為顧問，繼1914年後再次開始了對國民黨的改組。正如他在1924年1月2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詞〈革命成功在乎革命黨員有團體〉中所言：「本黨以前的失敗，是各位黨員有自由，全黨無自由；各位黨員有能力，全黨無能力。中國國民黨之所以失敗，就是這個原因。我們今日改組，便先要除去這個毛病。」^⑥

按照汪精衛的說法，孫文於1921年在桂林見到馬林時，就已經根據馬林的說明感覺到俄國的新經濟政策與他的「民生主義」的性質是一致的，另外俄國也曾明確聲明：「援助國民革命，不在中國國內宣傳共產主義」，這些都是促使孫文接受俄國援助的原因^⑦。但從孫文並非在會見馬林之後、而是在陳炯明叛亂之後才下定決心「聯俄」來看，其主要目的無疑是要借鑒俄國布爾什維克的經驗對國民黨進行改組。

汪精衛當時也積極支持孫文的政策，他在1924年國民黨一大中被孫文指派為五人主席團主席之一，並被推舉為國民黨章程審查委員會主席，參與起草了大會宣言。汪在〈中國國民黨何以有此次宣言〉中說道^⑧：

在今日之環境中，我們在精神上有一種說不出的苦痛：便是中國的現狀和我們的主義不能相合，不但不能相合，而且相反。所以不能一致的最大原因，是革命黨和群眾還沒有真正密切地結合。革命黨如何能和群眾做真正密切的結合呢？第一要訓練革命黨自己，第二要向群眾宣傳。根據這訓練和宣傳兩個理由，中國國民黨才有此次的宣言。

此外，蔣介石看到「黨的組織亦益渙散」，「有志者人自為戰，不肖者掛名投機，革命建國事業更無由着手」，也認為國民黨必須改組：「非整理黨務，無從奮起。」1923年8月，他被孫文指派為「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團長。9月2日到11月29日，蔣在蘇聯實地考察黨務、軍事和政治。按照他事後的說法，他在蘇聯找到了布爾什維克取得勝利的原因：「要一個黨來做中心，統一革命勢力」，之後「拿到了政權，極端的專政」^⑨。1924年1月24日，國民黨一大期間，蔣被委任為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會委員長（當年5月3日被任命為校長兼粵軍參謀長）。5月，孫文在蘇聯顧問的幫助下建立了這所黃埔軍校，目標就是為了建立一支只服從國民黨領導的軍隊。顯然，孫文通過「聯俄」從蘇聯學到的，就是在從嚴治黨的基礎上建立黨國、黨軍的政治體制。同年7月7日，孫文以中央執行委員會名義發表了〈中國國民黨關於黨務宣言〉，申明黨員必須遵守黨紀：「本黨既負有中國革命之使命，即有集中全國革命份子之必要，故對於規範黨員，不問其平日屬何派別，惟以其言論行動能否一依本黨之主義政綱及黨章為斷。如有違背者，本黨必予以嚴重之制裁，以整肅紀律。」^⑩

孫文的黨國、黨軍思想對此後近代中國的政治生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孫文改組國民黨後，民主集權制自此成為近代中國政黨的主要組織原則。蔣介石甚至在1951年重訂〈中國國民黨黨員守則淺釋〉時仍力推民主集權制：「根據民主集權制的原則，本黨政策在討論階段，是民主的，人人都可以發表意見，自由討論；在執行階段是集權的，一經共同決議，必須一致執行，以求行動之統一與力量之集中。行動統一的規律，是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領袖。」^⑪

但值得注意的是，通過改組告誡黨員必須服從上級，這在國民黨歷史上並非是第一次。「二次革命」失敗以後，孫文於1914年在東京將國民黨改組為「中華革命黨」，堅持黨員對領袖必須絕對忠誠的原則：「因鑒於前此之散漫不統一之病，此次立黨，特主服從黨魁命令，並須各具誓約，誓願犧牲生命、

自由權利，服從命令，盡忠職守，誓共生死。」^⑫「弟所望黨人者，今後若仍承認弟為黨魁者，必當完全服從黨魁之命令。因第二次〔革命〕之失敗，全在不聽我之號令耳。所以，今後弟欲為真黨魁，不欲為假黨魁。」^⑬「是以此次重組革命黨，首以服從命令為惟一之要件。凡入黨各員，必自問甘願服從文一人，毫無疑慮而後可。」^⑭甚至規定：「總理有全權組織本部為革命軍之策源，協理輔助之或代理之」，「本部各部長、職員悉由總理委任」^⑮。

因孫文所提倡的這種準極權體制引起了黨內的不滿，第一次改組成效不大。論者指出，「1924年的國民黨改組主要是借鑒了俄共布爾什維克的組織模式」^⑯，與第一次改組最明顯不同的是強調建設一個紀律嚴密、因而具有戰鬥力的「組織」，而「黨在國家之上」、「黨在軍隊之上」的黨治原則也由此確立。1923年11月的〈中國國民黨改組宣言〉直言：「欲起沉疴，必賴乎有主義、有組織、有訓練之政治團體，本其歷史的使命，依民眾之熱望，為之指導奮鬥，而達其所抱政治上之目的。否則民眾蠕蠕，不知所向，唯有陷為軍閥之牛馬，外國經濟的帝國主義之犧牲而已。」^⑰從這裏可以看出，第二次改組中出現的黨治原則是建立在一種民眾的精英意識之上的。但是從第一次改組就已經提出「軍政、訓政、憲政」三期說^⑱來看，國民黨高層的這種精英意識其實一直都存在。日後的「一個信仰，一個領袖，一個政府」的起源，也許可以追溯到這裏^⑲。由此可見，在精英治國的意義上，雖然個人領袖被幻化為「黨組織」，但是兩次改組其實並沒有本質上的差異。或者說，「聯俄」並沒有改變孫文和國民黨高層對中國社會的基本認識，第二次改組只是從俄國學來了一種更有利於精英階層進行治黨、治國的組織形式而已。

那麼，為甚麼「十月革命」不僅沒有帶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學說，反而強化了國民黨高層的精英治國理念呢？這與孫文對俄國革命以及「共產主義」進行的解讀有着直接的關係。關於這一點，可以參考孫文在1924年1月20日國民黨一大開幕當天的一段說明^⑳：

現尚有一事，可為我們模範。即俄國完全以黨治國，比英美法之政黨握權更進一步。我們現在並無國可治，只可說以黨建國，待國建好，再去治他。當俄國革命時，用獨裁政治，諸事均一切不顧，只求革命成功。……俄國六年前之奮鬥，均為「民族主義」的奮鬥。當時我們尚不知其為民族主義奮鬥，今回顧起來，的確如此！故現在俄國對於贊成民族主義諸國，皆引為同調。常對波斯、阿富汗、土耳其諸國，勸其不可放棄民族主義。其最初之共產主義，亦由六年間之經驗，漸與民生主義相暗合。可見俄之革命，事實上實為三民主義。其能成功，即因將其黨放在國上。我以為今日是一大紀念日，應重新組織，把黨放在國上。

也就是說，讓孫文主張國民黨能夠接受「聯俄」的正當性根據，是他們在俄國革命的經驗中發現了能夠將之解讀為「三民主義」、尤其是「民族主義」思想的成份。例如，布爾什維克在「十月革命」之前披着「革命」外衣的「獨裁政治」可以被解釋為「民族主義的奮鬥」，「十月革命」之後蘇俄的經驗可以被解釋為「漸與民生主義相暗合」。對於當時正在準備北伐的國民黨人來說，「民族主

義的奮鬥」這種解讀，自然具有很強的說服力。這種從民族主義的層次上說明各種政治行動、包括結交革命盟友之正當性的思維模式，證明民族主義已經成為了近代中國判斷一個政治行為是否具有正當性的標準。

二 「階級」與「民族」的穿越——一種機會主義的解釋

值得注意的是，孫文對俄國革命和所謂的「共產主義」的這種解讀，當然是與俄國布爾什維克黨人向他進行的說明是分不開的。事實上，以號稱追求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而起家的俄國布爾什維克，在與中國國民黨方面進行接觸時，從未要求國民黨人用階級的觀點來看待中國國內的各種問題。相反，甚至可以看出他們將對孫文的支援有意地解釋為對中國「民族主義」的支持，例如孫文與越飛(Adolf A. Joffe)談判中提出的同意共產主義不能行於中國；蘇俄確認從前發表的放棄對中國特權的聲明仍然有效；對中東鐵路管理權的問題通過協商的方法解決；蘇俄承認對外蒙古並無領土野心等內容^②。於是，辛亥革命之後將「民族主義」的內容最終解釋為追求國家統一和國家獨立的孫文，也就能夠順水推舟地將「聯俄」解釋為一個一石二鳥、達到其民族主義之偉大目標的手段了。

事實上，在俄國國內，為了集結「革命」力量，列寧一貫反對按民族建黨。在他的領導下，1919年3月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決定：相當於各個加盟共和國的「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享有省級黨委會的權力，並且絕對服從中央委員會的領導」^③。他堅持在俄國革命黨內部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同時也反對國家組織形式上的聯邦制。在「世界革命」的問題上，列寧當初應該也同樣具有只使用「階級」而不使用「民族」觀點的想法。1919年初成立的共產國際，其目標就是以「要求各國革命的無產階級之間保持最大限度的聯繫，要求社會主義革命已經取得勝利的國家之間實行全面的聯合」，通過「無產階級的群眾性行動，直至拿起武器，同資本主義的國家政權實行公開的衝突」的鬥爭方法，從而使「無產階級……奪取國家政權」，實現「無產階級專政」^④，其中沒有任何關於「被壓迫民族」的訴求，甚至沒有任何關於「民族」的闡述。

而到了1921年，主張階級學說的俄國布爾什維克之所以能夠拿出這種容忍他國民族主義的方針來接觸孫文，是因為「十月革命」後的俄國在進入1920年代以後，為了打破在國際社會中的困窘局面而不得不制訂新的國際戰略，並在思想理論層面上也做出相應的調整。以列寧為首的俄國布爾什維克原本只想在具有一定工業勞動者數量的歐洲各國，即所謂的「文明國家」中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但是這種想法很快受到挫折。為了衝破帝國主義的包圍，俄國不得不將視點轉向東方，開始尋求與受到帝國主義欺凌的東方「落後國家」之間的聯合。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共產國際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列寧在7月26日第四次會議上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委員會的報告〉中提出：「我們看到，目前帝國主義階段的特點就是全世界已經劃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人數眾多的被壓迫民族，另一部分是擁有巨量財富和雄厚的軍事實力的少數壓迫民族。世界人口的大多數，有10億以上，都是被壓迫民族，他們的總數大約是12億5千萬。我們把世界總人口算作17億5千萬，他們就佔世界人口的

70%。」所以，「我們提綱中的第二個指導思想就是：在目前的世界形勢下，在帝國主義大戰以後，各民族的相互關係、全世界國家體系，將取決於少數帝國主義國家反對蘇維埃運動和以蘇維埃俄國為首的各個蘇維埃國家的鬥爭。……無論是文明國家的共產黨，還是落後國家的共產黨，都只有從這種觀點出發，才能正確地提出和解決各種政治問題。」^{②4}

在上述會議中，列寧提出「殖民地國家的資產階級解放運動」的問題，甚至主張「把『資產階級民主』字樣幾乎都改為『民族革命』才是正確的」^{②5}。根據列寧的意見，《共產黨宣言》提出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被修改為「全世界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②6}。雖然共產國際沒有說明如何通過「民族革命」的手段來達到「階級鬥爭」的目標，即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但是這段歷史說明，對以列寧為首的俄國布爾什維克來說，只要冠以「革命」的名義，在「革命」的脈絡中，「階級」與「民族」這兩個原本構成要素和性質完全不同的概念，就可以隨意被穿越。

這種從「民族」的視點對「革命」所進行的闡釋，正是孫文能夠說服自己及其同志接受「聯俄」政策所需要的。那麼，接受「容共」的政策是不是也以此為前提呢？回答也是肯定的。可以看到，列寧和共產國際提出的「全世界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的口號，在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李大釗（孫文接受「聯俄容共」政策即由李穿針引線）的文章中，就變成了「被壓迫民族及被壓迫階級聯合起來！」^{②7}這裏的順序顛倒證明，比起列寧和共產國際，李大釗事實上更加願意強調中國革命的性質是「民族解放」，更加願意把「聯俄容共」說成是為了「民族解放」的目的。

1924年3月30日，李大釗在中華民國國民追悼列寧大會刊行的《列寧紀念冊》中寫道：「列寧逝世，全人類的損失，真不在小，尤其是我們中華民族損失了一個這樣重要的朋友，更使我們感傷無已。……列寧是弱小民族的良朋，是被壓迫者的忠僕，是獻身於世界革命的一個仁勇的戰士。」^{②8}5月1日，李大釗在《北大經濟學會半月刊》第二十四期上發表「在民國十三年五一紀念日示威運動」中五條「我的國民的吶喊」，除了前述的「被壓迫民族及被壓迫階級聯合起來」之外，還有一條為「恢復中華民族的獨立自由！」他並且指出「這都是我們最近的民族的痛辱」^{②9}。1926年3月12日，李大釗在《國民新報》的「孫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紀念特刊」中撰文：「孫中山先生所指導的國民革命運動，在中國民族解放全部歷史中，實據有中心的位置，實為最重要的部分」；「他以畢生的精力，把中國民族革命種種運動，疏導整理，溶解聯合，以入於普遍的民眾革命的正軌。他那臨終的遺囑，明明白白告訴我們中國的國民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③0}。以上文字似乎也可以證明，李大釗之所以對俄國和列寧的學說發生興趣，也是從「民族」的視點出發的。

根據《李大釗年譜》，從留學日本期間開始李大釗即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③1}。但有論者指出，早期的李大釗具有「思想的二重性」，即其思想並不是單純用馬克思主義思想可以完全解釋的，而造成這種二重性的「深刻的社會根源與認識根源」，其一即為「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想」^{③2}。其實，李大釗最初的確沒有從階級革命的層次來認識俄國「十月革命」的性質。1918年7月，他將「十月革命」與法國大革命進行比較：「法人當日之奔走呼號，所索者『自由』，

俄人今日之渙汗絕叫，所索者『麪包』。」「法人當日之精神，為愛國的精神，俄人之今日精神，為愛人的精神。前者根於國家主義，後者傾於世界主義；前者恆為戰爭之泉源，後者足為和平之曙光，此其所異者耳。」「俄羅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紀初期之革命，是立於社會主義上之革命，是社會的革命而並着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³³

及至中國民眾歡呼中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成為戰勝國，李大釗才開始使用「階級」的話語。1918年11月15日，他稱：「原來這回戰爭的真因，乃在資本主義的發展。國家的界限以內，不能涵容他的生產力，所以資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戰，把國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國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國，成一個經濟組織，為自己國內資本家一階級謀利益。」³⁴此外，他說道：「對於德國軍國主義的勝利，不是聯合國的勝利，更不是我國徒事內爭托名參戰的軍人，和那投機取巧賣乖弄俏的政客的勝利，而是人道主義的勝利，是平和思想的勝利，是公理的勝利，是自由的勝利，是民主主義的勝利，是社會主義的勝利，是Bolshevism的勝利，是赤旗的勝利，是世界勞工階級的勝利，是二十世紀新潮流的勝利。」³⁵

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時的李大釗還同意布爾什維克指導下的群眾運動來源於宗教狂熱的觀點：「倫敦『泰晤士報』曾載過威廉氏(Harold Williams)的通訊，他把Bolshevism看做一種群眾運動，和前代的基督教比較，尋出二個相似的點：一個是狂熱的黨派心，一個是默示的傾向。……這話可以證明Bolshevism在今日的俄國，有一種宗教的權威，成為一種群眾的運動。豈但今日的俄國，二十世紀的世界，恐怕也不免為這種宗教的權威所支配，為這種群眾的運動所風靡。」「二十世紀的群眾運動，是合世界人類全體為一大群眾，這大群眾裏邊的每一個人、一部分人的暗示模仿，集中而成一種偉大不可抗的社會力。」³⁶從這一對布爾什維克的群眾運動性質的判斷來看，李大釗之所以為俄國革命所吸引，與其說是因其具有階級革命的性質，還不如說是因其具有強大的動員力和組織力。日後，李大釗形容孫文的活動為「繼承了太平天國的革命的正統，而淘汰了他們的帝王思想、宗教思想」，然而，即使在這一敘述脈絡中，他也認為太平天國以來的「革命的正統」就是「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和「中國民族革命」³⁷。由此可見，民族主義的思維模式，無疑造就了李大釗接受俄國革命、尤其是布爾什維克的大規模群眾運動形式。

三 「民族主義」視點——陳獨秀的反日與親俄

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領袖陳獨秀，在1915年9月15日的〈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中就已經提到社會主義思想和馬克思：「欲去此不平等與壓制，繼政治革命而謀社會革命者，社會主義是也。可謂之反對近世文明之歐羅巴最近文明。其說始於法蘭西革命時，有巴布夫(Babeuf)者，主張廢棄所有權，行財產共有制(La communaute des biens)。……彼等所主張者，以國家或社會，為財產所有主，人各從其才能以事事，各稱其勞力以獲報酬，排斥違背人道之私有權，而建設一新社會也。其後數十年，德意志之拉薩爾(Lassalle)及馬克

斯(Karl Marx)承法人之師說，發揮而光大之，資本與勞力之爭愈烈，社會革命之聲愈高。」^{③⑩}但是，1919年間，讓陳獨秀開始注意到俄國「十月革命」的，同樣不是階級學說，而是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對國際社會的衝擊：「英美兩國有承認俄羅斯布爾什維克政府的消息，這事如果實行，世界大勢必有大大的變動。十八世紀法蘭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紀俄羅斯的社會革命，當時的人都對着他們極口痛罵；但是後來的歷史家，都要把他們當做人類社會變動和進化的大關鍵。」^{③⑪}「俄國Lenin一派的Bolsheviki的由來，……日本人硬叫Bolsheviki做過激派，和各國的政府資本家痛恨他，都是說他擾亂世界和平。Bolsheviki是不是擾亂世界和平，暫且不論他，痛恨Bolsheviki的各強國，天天在那裏侵略弱小國的土地利權，是不是擾亂世界〔和〕平。」^{③⑫}

將布爾什維克對中國的政策與日本對中國及朝鮮的侵略作比較，是陳獨秀俄國革命論的一個重要特點：「Bolsheviki是不是擾亂世界和平，全靠事實證明，用不着我們辯護或攻擊；我們冷眼旁觀的，恐怕正是反對Bolsheviki的先生們出來擾亂世界和平！……現在反對他們的人，還仍舊抱着軍國侵略主義，去不掉個人的一階級的一國家的利己思想，（日本壓迫朝鮮，想強佔青島土地和山東的經濟利權，就是一個顯例。）如何能夠造成世界和平呢？」^{③⑬}陳獨秀的論述之所以具有這一特點，其原因不言自明——「十月革命」之後的俄國布爾什維克政權，曾經一時答應歸還以往帝俄時期侵佔的中國領土：「日本侵略我們土地利權的，是那軍閥、財閥、外交官和保守主義的新聞記者，那進步主義的社會黨人，卻都以為不應該侵略中國。進步主義的列寧政府，宣言要幫助中國，保守主義的渥木斯克政府，自己已經是朝不保夕了，還仍舊想侵略蒙古和黑龍江；他若是強起來，豈不是第二個日本嗎？」^{③⑭}

但是應該注意到，陳獨秀的日本觀其實是有一個變化過程的。在更早時期，陳獨秀常常將日本人的民族性以及日本的各種制度作為參照物，藉以對中國社會進行批評。1915年間，他撰文寫道：「日本福澤諭吉有言曰：『教育兒童，十歲以前，當以獸性主義；十歲以後，方以人性主義。』……強大之族，人性、獸性，同時發展。其他或僅保獸性，或獨尊人性，而獸性全失，是皆墮落衰弱之民也。」^{③⑮}「乃木希典有言曰：訓練青年，當使身心悉如鋼鐵。……岩崎氏者，以窮漢而成日本之第一富豪，其死也，臥病數十日，未嘗一出呻吟之聲。美利堅力戰八年而獨立，法蘭西流血數十載而成共和；此皆吾民之師資。」^{③⑯}直至一戰結束時，陳獨秀仍然是對日本人的民族性誇獎有加：「日本東京慶祝協約戰勝的時候，慶應大學學生五千人，開提燈大會，前豎一面大旗，上面寫了『倒軍閥』三個大字，遊行時經過的衙署都招待他們，惟有參謀部合〔和？〕陸軍部不理。我們天津的慶祝會，南開學校的學生卻異想天開，做一個『國魂舟』，兩位學生裝扮關羽岳飛坐在船內，遊行街市。一個是反對武人政治（乃木、東鄉〔平八郎〕，真算得是中國關岳一流人物，何以日本青年不崇拜他，還要反對他呢？）一個是崇拜忠孝節義時代的武人。現在兩國的青年思想如此不同，將來的國運就可想而知了。」^{③⑰}

對日本人民族性的讚許，自然是建立在對中國人民族性進行批判的基礎上的。以近代日本為榜樣建設近代國家和國民，幾乎是所有近代中國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日本觀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與其他人不同，陳獨秀幾乎是全面地接

受了日本人對中國民族性的批判：「外人之譏評吾族，而實為吾人不能不俯首承認者，曰『好利無恥』，曰『老大病夫』，曰『不潔如豕』，曰『游民乞丐國』，曰『賄賂為華人通病』，曰『官吏國』，曰『豚尾客』，曰『黃金崇拜』，曰『工於詐偽』，曰『服權利不服公理』，曰『放縱卑劣』；凡此種種，無一而非亡國滅種之資格，又無一而為獻身烈士一手一足之所可救治。一國之民，精神上，物質上，如此退化，如此墮落，即人不我伐，亦有何顏面，有何權利，生存於世界？」^④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對中國民族性的形容幾乎都是來自日本人的。可以說，陳獨秀的價值觀判斷標準中有很多地方是與日本社會相通的。

直至陳獨秀得知巴黎和會上日本的野心後，其日本觀才開始有所改變。1919年3月3日，他數次談到日本政府覬覦中國領土的野心，並表示反感：「歐洲和會，已有反對秘密外交的趨勢。而口口聲聲說中日親善的日本，偏偏不許我們宣布中日秘約。……偏偏要把山東的鐵道鑛山，做青島交還的條件。中日親善，原來就是這樣！」^④「歐洲的德意志，已經拋棄軍國主義了。亞洲的德意志，還是毫無覺悟。他對於世界上的事，反對縮減軍備與廢止徵兵，和自由主義的英美不合。他對於中國的事，袒護軍閥，反對裁撤參戰軍，又和自由主義的英美不合。他如此迷信武力，且看他將來的運命如何。」^④但是我們看到，即使在這個時刻，陳獨秀對日本對待朝鮮和台灣的做法和日本人的民族性還保留着一些讚許的成份。他在批評中國政府劃分軍區的做法時說道：「日本鑒於世界大勢，要將朝鮮和台灣的總督，改用文官，免得軍治制度招朝鮮人和台灣人的反抗。想不到我們中華民國裏，口稱護法的人，還有分設九軍區的主張。劃分軍區，就是承認軍人有管轄區域，就是承認軍治制度。這是比日本人對待被征服的朝鮮台灣還不如。」^④又如，他激烈批評日本對朝鮮「三一獨立運動」的鎮壓，同時卻又說道：「我想富於自由獨立大和魂的日本人，對於朝鮮人這回悲壯的失敗，都應該流幾點同情的熱淚。」^④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五四運動中陳獨秀對日本的批評，其實都是從民族主義的立場上出發的。這些批評當中甚至帶有民族歧視的成份。就讓我們看一些1919年5月4日當天陳獨秀發表的文字：「無論鐵路問題，青島問題，大而至於全國政權問題，不用說我們最希望的是自己管理。倘若自己不能管理，只好讓列強共同管理。我們最反對的，是讓日本管理。因為日本管理的地方，不但兵隊警察要來，那賣淫的、賣藥的、賣鴉片的、賣嗎啡的，收買銅錢的，一齊都要來，都要把中國人踩在腳底下當狗打。打過了還要中國人和顏悅色的同他『親善』，不然就加上你一個『排日』的罪名。老實不客氣，我們中國若免不得亡國的運命，寧可亡在歐美列國手裏，不願亡在日本手裏。」^④「藝術是何等神聖的事業，梅蘭芳懂的甚麼？他到日本，聽說很受日本人歡迎。若是歡迎他的藝術，我為中國藝術羞煞！若是歡迎他的容貌，我為中國民族羞煞。」^④正是在這種激烈的民族主義思維的脈絡中，陳獨秀通過將布爾什維克對中國的政策與日本對中國及朝鮮的侵略進行比較之後，才開始轉變對日本的態度，並開始表現出對「十月革命」之後「宣言要幫助中國」的「進步主義的列寧政府」^④產生了親近感。

事實上，與中國近代許多思想家和政治家一樣，無論是陳獨秀還是李大釗，都因為留學日本的經歷而培養了他們的民族主義思維模式。陳獨秀先後

數次自費留學日本（一說為五次），1902年9月進入東京成城學校陸軍科，冬季與張繼、蔣百里、蘇曼殊等人組織「青年會」，據說其〈會約〉中即有「以民族主義為宗旨，以破壞主義為目的」之語。1903年3月，他因剪辮子被送回國，4月籌組「安徽愛國會」，6月於《蘇報》發表組會宗旨：「聯絡東南各省志士，創一國民同盟會，庶南方可望獨立，不受異族之侵凌」，並因發表這些排滿民族主義的言論受到追捕。但在8月他又與章士釗等在上海創辦《國民日日報》，明言「宗旨在於排滿革命」。1907年春，陳再到日本進入正則英語學校就讀，參加章太炎、劉師培、蘇曼殊和幸德秋水等人發起的「亞洲和親會」：「本會宗旨，在反對帝國主義，期使亞洲已失主權之民族，各得獨立。」1909年9月回國，1914年7月再應章士釗之邀，赴日本助編《甲寅》雜誌，同時入讀雅典娜法語學校，直至1915年雜誌移到上海，陳才一同回國⁶⁴。由以上經歷可知，辛亥革命以前，陳獨秀的生活中一直存在着日本的因素，其思想受到了日本民族主義的強烈影響。我們看到，甚至直到辛亥革命之後的1915年底，他仍在極力鼓吹國家主義：「吾人非崇拜國家主義，而作絕對之主張；良以國家之罪惡，已發見於歐洲，且料此物之終毀。第衡之吾國國情，國民猶在散沙時代，因時制宜，國家主義，實為吾人目前自救之良方。」⁶⁵

從陳獨秀受到近代日本的影響，到「十月革命」以後對俄國產生好感，其思想歷程說明，民族主義的思維一直是他此間投身政治運動的基本動力，這與孫文為了借鑒俄國革命黨的經驗和利用俄國的支援，而將布爾什維克指導的「革命」、「獨裁政治」故意解讀為「民族主義的奮鬥」顯然不同。但是二人之所以都願意從民族主義的角度看待列寧所指導的俄國革命方式，應該都是由於感到了這種俄國革命方式可以給民族主義的政治精英提供更大的活動空間。

四 血緣民族主義與精英意識——「以黨治國」的魅力

無論是李大釗、陳獨秀還是孫文，從他們的民族主義言論和行動中，都可以看到一種「世人皆醉我獨醒」、因而負有喚醒國人之義務的強烈的精英意識。李大釗1913年冬赴日，1914年春進入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臨行前賦詩曰：「班生此去意何云，破碎神州日已曛。去國徒深屈子恨，靖氛空說岳家軍。」⁶⁶無疑，李大釗是抱着民族主義救國的想法走上東渡求學之路的。由於時值辛亥革命以後，李大釗的民族主義思想不是表現為排滿，而是表現為對甲午戰爭以來日本侵略中國的仇恨。在日本對華提出「二十一條」的1915年6月，他撰寫〈國民之薪膽〉一文，將甲午、甲辰（日俄戰爭）、甲寅（日德戰爭）的「三甲」之役比作「宜鑄骨銘心紀其深仇大辱者」⁶⁷。1915年5月，李大釗棄學歸國，8月在北京創辦《晨鐘報》，希望通過喚起國民的民族主義意識以救國：「吾儕振此『晨鐘』，……俾吾民族之自我的自覺。」「外人之詆吾者，輒曰：中華之國家，待亡之國家也；中華之民族，衰老之民族也。斯語一入吾有精神、有血氣、有魂、有膽之青年耳中，鮮不勃然變色，思與四億同胞發奮為雄，以雪斯言之奇辱者。」「環顧茲世，新民族遂無復存。故今後之間

題，非新民族崛起之問題，乃舊民族復活之問題也。而是等舊民族之復活，非其民族中老輩之責任，乃其民族中青年之責任也。」⁶⁸

李大釗這種帶領國人奮鬥、拯救國家國民的精英意識，在五四運動以後得到了進一步的昇華。他在1920年1月25日的《新生活》第二十三期上發表〈知識階級的勝利〉一文，認為「『五四』以後，知識階級的運動層出不已。到了現在，知識階級的勝利已經漸漸證實了。我們很盼望知識階級作民眾的先驅，民眾作知識階級的後盾。知識階級的意義，就是一部分忠於民眾作民眾運動的先驅者」⁶⁹。今人指責陳獨秀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根據之一，就是他「滿足於居高臨下的『先生』身份」，「陳獨秀曾多次把群眾稱為『一盤散沙，一堆蠢物』，甚至說：『群眾心理都是盲目的，無論怎樣大的科學家，一旦置身群眾，便失了理性』，鼓吹對群眾要由少數人實行『干涉主義』」⁷⁰。

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想家之所以會有這種不加任何掩飾的政治精英意識，這和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血緣民族主義性質有關。李大釗於1915年以「留日學生總會」名義撰寫的〈警告全國父老書〉可為一例：「戰雲四飛，倭族乘機，偪我夏宇。……萬一橫逆之來，迫我於絕境，則當率我四萬萬忠義勇健之同胞，出其丹心碧血，染吾黃帝以降列祖列宗光榮歷史之末頁。」「抑日本蕞爾窮島，力非能亡我中國者。……居東京，適遊就館〔今靖國神社之史料館部分〕，見其陳列虜奪之物，莫不標名志由，誇為國榮。鼎彝遷於異域，銅駝泣於海隅，睹物傷懷，徘徊不忍去。……國人及今而猶不知自覺，……炎黃遠裔，將淪降於永劫不復之域，而滅國之仇，夷族之恨，真天長地久，無復報雪之期矣！嗚呼同胞！亦知今世亡國之痛乎？」他同時指出：「舉國一致，眾志成城。勝則此錦繡之江山可保，而吾祖宗襲傳之光榮歷史，從此益可進展於無窮。敗則錦繡之江山雖失，而吾祖宗襲傳之光榮歷史，遂結束於此。葆有全始全終之名譽，長留於宇宙之間，雖亡國殺身，亦可告無罪於我黃帝以降列祖列宗之靈也。」⁷¹

從文中反覆出現「黃帝以降列祖列宗」、「炎黃遠裔」、「祖宗」、「同胞」等民族主義話語中可以感知：儘管當時已經進入民國時期，但李大釗的民族主義思想仍然表現出強烈的血緣民族主義性質，與二十世紀初期留日學生所鼓吹的排滿的血緣民族主義的性質如出一轍——原本顯然是公的領域中關於國家政治的問題，卻要從私的血緣關係的角度去區分敵我是非，這是血緣民族主義的特點。當年的陳獨秀當然也不出此列，他在1904年說道：「唉！我們黃帝老祖宗丟下來幾千年的好江山，到了今日子孫無用，糊裏糊塗的讓了外人。……眼見得故國山河，已不是我漢種人的世界，既悲以往，又思將來，豈不是一件可惱可哭可怕的事體麼！」⁷²近代中國的血緣民族主義，是中國傳統的家族制社會和日本近代的單一民族國家思想相結合的產物⁷³。按照共同血緣的原則構成的宗族組織是傳統精英的搖籃，但是因為宗族組織和科舉制之間的互動關係，對於追求「修齊治平」的科舉精英來說，公與私的領域之間本來就沒有不可逾越的明顯界線。儘管進入二十世紀以後中國不得不告別了科舉制度，但是傳統的宗族組織並沒有被打散，讀書人的精英意識依然在傳統的家族制社會中被保留了下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人在接受了民族主義的思想以後，更願意將他們的精英意識表現在「民族」和「民族國家」的層面。例如，1904年陳獨秀就開始教育中國社會需要建設具有「同種類」的「民族國家」

的意義：「一國的人民，一定要同種類，同歷史，同風俗，同言語的民族，斷斷沒有好幾種民族，夾七夾八地住在一國，可以相安的道理。所以現在西洋各國，都是一種人，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不受他種人的轄治。這就叫做『民族國家主義』。若單講國家主義，不講民族國家主義，這國家到底是誰的國家呢？原來因為民族不同，才分建國家。」^④

由於這種精英意識，陳獨秀的思想中甚至具有反民主主義的成份：「民主主義是甚麼？乃是資本階級在從前拿他來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在現在拿他來欺騙世人把持政權底詭計。……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全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錯而特錯。資本和勞動兩階級未消滅以前，他兩階級底感情利害全然不同，從哪裏去找全民意？……民主主義只能夠代表資產階級意，一方面不能代表封建黨底意，一方面更不能代表勞動階級底意。」^⑤「一聽說勞動階級專政，馬上就抬出德謨克拉西來抵制，德謨克拉西到〔倒？〕成了資產階級底護身符了。我敢說：若不經過階級戰爭，若不經過勞動階級佔領權力階級地位底時代，德謨克拉西必然永遠是資產階級底專有物，也就是資產階級永遠把持政權抵制勞動階級底利器。」^⑥必須看到的是，這種反民主主義的精英思想，不僅可以成為任意抹殺民意的根據，也可以成為「以黨治國」思想在中國立足的基石。例如，陳獨秀就曾經如此闡述政黨與人民、國家之間的關係：「無論是有產階級的政黨或無產階級的共產黨，凡是直接擔負政治責任之團體，似乎都算是政黨。一般人民雖然都有選舉被選舉權，但實際上被選舉的究竟多是政黨；一般人民雖然都有參與政治的權利，但實際上處理政務直接擔負政治責任的究竟還是政黨。」^⑦

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指出1923年6月的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中央內部即直接稱呼陳獨秀為「家長」。此後，他的同志又批評陳獨秀實行「家長制」^⑧。毛澤東也曾在與美國記者斯諾(Edgar Snow)談話中指責陳獨秀：「在那個時候，陳獨秀是中國黨的徹頭徹尾的獨裁者，他甚至不同中央委員會商量就作出重大的決定。」^⑨陳獨秀的思想和行為可以說明，在由血緣民族主義而來的精英意識中，天然具備着接受俄國布爾什維克的「民主集中制」、領袖獨裁和「以黨治國」思想的素質。

這一點從孫文的「革命」過程中也可以得到證實。眾所周知，孫文設「訓政」時期的理由是「承認中國人民的政治能力尚低」，「如果人民尚不知如何行使民權，應該給他們一個學習的機會」^⑩。到了1920年10月10日，孫文提議將「中華革命黨」改為「國民黨」，並將「中國革命」的過程分為「革命政治」和「政黨政治」兩個時期。論者指出，「總章第四條規定：『自革命起義之日至憲法頒布之日，總名曰革命時期。在此期內，一切軍國庶政，悉由本黨負完全責任。』由此可知此時中山先生已決心實行革命政治，而在革命未成功以前，不再實行政黨政治」。1921年，孫文又提出「以黨治國」的口號：「我們要達到『以黨治國』的目的，此刻便應趕快下手，結合團體……」^⑪當時即有人指出，「以黨治國」即是「一黨專政」，孫文強調的「以黨治國」和「一黨專政」，實際上是要貫穿「軍政」、「訓政」和「憲政」三個時期^⑫。從孫文開始的「以黨治國」和「一黨專政」，雖說是來自俄國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但是這些理念之所以能夠在中國大地上生根，不得不說它在一定意義上契合了中國文化中的精英治國傳統。

五 結語

限於篇幅，本文僅檢視了中國近代史上幾位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活動及其背後的思想軌迹，發現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的首腦人物，不僅大都具有留學日本或在日本從事政治活動的經驗，而且都對俄國「十月革命」之所以能夠很快取得勝利的理由發生了濃厚興趣。然而，由於在日本期間所形成的民族主義思維，「十月革命」吸引他們的不是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的學說，而是布爾什維克的「民主集中制」組織形式和俄國國家政治中的「以黨治國」理念對實現中國的民族主義目標時所能發揮的作用。所以，與其說他們受到俄國革命思想的影響，不如說受到俄國革命黨思想的影響。換言之，民族主義給他們提供了一個可以用來動員民眾的偉大目標，而俄國革命給他們提供的不過是實現這個目標的一個手段，這也正是日俄兩國在中國近代政治進程中所扮演過的不同角色。由於在民族主義的基礎上導入了「民主集中制」和「以黨治國」的理念，因此近代中國政治也就能夠從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走到一個信仰、一個領袖、一個政府，最後接受了一黨專政和領袖獨裁的政治形態。

然而，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學說與民族主義，是兩種構成元素不同因而性質迥異的思想。中國近代以來之所以能夠形成一種以民族主義為基礎的、掛着「階級」名義的一黨專政和領袖獨裁的政治生態，與近代民族主義被嫁接在傳統家族制上而具有血緣民族主義的性質、從而生產出具有強烈精英意識的階層有關。中國傳統的家族與政治—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其實是一個產生和持續更新權力正當性的裝置，因此具有頑強的生命力。隨着「天下」變為「民族國家」之後，傳統的科舉精英階層轉化為近代的民族主義精英，而比照家族關係看待和處理國家政治的慣性思維，也使民眾願意接受掛着「民族」領袖招牌的政治家帶來的一黨專政和領袖獨裁。近代日本的民族主義同樣具有血緣民族主義的性質，然而中國由於傳統的家族與政治—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至今使公、私領域二者之間的界限更加曖昧，稱國民黨領導人為「國父」，稱中共領導人為「大大」，誇耀中共領導人的「紅色血脈」等現象層出不窮，就是一個個典型的事例。

註釋

① 「毛澤東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可是，馬克思主義之傳入中國，卻不是首先來自於十月革命的故鄉蘇俄。」參見〈馬克思主義是怎樣傳入中國的？〉（2011年5月31日），中國網，www.china.com.cn/cpc/2011-05/31/content_22676563.htm。

② 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編：《孫中山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286。

③④⑤⑥⑦ 崔書琴：《孫中山與共產主義》（台北：傳記文學雜誌社，1984），頁12；23-25；106-107；123；124。

⑧⑨ 安藤德器：《汪精衛自敘傳》（東京：大日本雄辯會講談社，1943），頁83；81、83。

- ⑤ 孫中山：〈中國現狀及國民黨改組問題〉，載《國父全書》（台北：國防研究院，1960），頁961。
- ⑥ 孫中山：〈革命成功在乎革命黨員有團體〉，載《國父全書》，頁960。
- ⑦ 蔡德金、王升編著：《汪精衛生平紀事》（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3），頁48。
- ⑧ 劉紅：《蔣介石大傳》，上冊（北京：團結出版社，2001），頁91-93。
- ⑨ 孫中山：〈中國國民黨關於黨務宣言〉，載《國父全書》，頁759-60。
- ⑩ 〈中國國民黨黨員守則淺釋（重訂）〉（1951年12月5日），載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二十四卷（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58），頁315。
- ⑪ 〈致南洋革命黨人函〉，載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編：《孫中山全集》，第三卷（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81。另外，《中華革命黨總章》明確規定：「凡進本黨者必須以犧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權利而圖革命之成功為條件，立約宣誓，永久遵守。」參見《中華革命黨總章》，第七條，收入《孫中山全集》，第三卷，頁98。
- ⑫ 〈致黃興函〉，載《孫中山全集》，第三卷，頁89。
- ⑬ 〈致陳新政暨南洋同志論組織中華革命黨之意義書〉，載《孫中山全集》，第三卷，頁92。
- ⑭ 《中華革命黨總章》，第十六、十七條，頁98。
- ⑮⑯ 田飛龍：《政治憲法的中國之道》（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7），頁173；172。
- ⑰ 孫中山：〈中國國民黨改組宣言〉，載《國父全書》，頁757。
- ⑱ 《中華革命黨總章》，第四條，頁97。
- ⑲ 孫中山：〈組織政府案之說明〉，載《國父全書》，頁961。
- ⑳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記錄，俄文版，頁425。轉引自華辛芝：《列寧民族問題理論研究》（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頁80。
- ㉑ 〈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邀請書〉，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編譯：《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1919-1928）》，第一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頁4-5。
- ㉒㉓ 列寧的發言，參見〈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討論民族與殖民地問題〉，載《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1919-1928）》，第一輯，頁20；21。
- ㉔ 華辛芝：《列寧民族問題理論研究》，頁56。
- ㉕ 李大釗：〈這一周〉（1924年5月1日）、〈中山主義的國民革命與世界革命〉（1926年），載《李大釗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頁503、563。
- ㉖ 李大釗：〈列寧不死〉（1924年3月30日），載《李大釗選集》，頁501。
- ㉗ 李大釗：〈這一周〉，頁503。
- ㉘㉙ 李大釗：〈孫中山先生在中國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1926年3月12日），載《李大釗選集》，頁538、543；543。
- ㉚㉛ 《李大釗年譜》編寫組編：《李大釗年譜》（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頁17；16。
- ㉜ 呂明灼：《李大釗思想研究》（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頁113。
- ㉝ 李大釗：〈法俄革命之比較觀〉（1918年7月1日），載《李大釗選集》，頁101、102。
- ㉞ 李大釗：〈庶民的勝利〉（1918年11月15日），載《李大釗選集》，頁110。
- ㉟㊱ 李大釗：〈Bolshevism的勝利〉（1918年11月15日），載《李大釗選集》，頁113；115、117。
- ㊲ 陳獨秀：〈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1915年9月15日），載《獨秀文存》，上冊（香港：遠東圖書公司，1965），卷一，頁14。
- ㊳ 陳獨秀：〈二十世紀俄羅斯的革命〉（1919年4月20日），載《獨秀文存》，下冊，卷二，頁29。

- ④① 陳獨秀：〈過激派與世界和平〉（1919年12月1日），載《獨秀文存》，下冊，卷二，頁66；66、67。
- ④② 陳獨秀：〈保守主義與侵略主義〉（1920年1月1日），載《獨秀文存》，下冊，卷二，頁78。
- ④③ 陳獨秀：〈今日之教育方針〉（1915年10月15日），載《獨秀文存》，上冊，卷一，頁25；23。
- ④④ 陳獨秀：〈抵抗力〉（1915年10月15日），載《獨秀文存》，上冊，卷一，頁34。
- ④⑤ 陳獨秀：〈倒軍閥〉（1918年12月29日），載《獨秀文存》，下冊，卷二，頁5。
- ④⑥ 陳獨秀：〈我之愛國主義〉（1916年10月1日），載《獨秀文存》，上冊，卷一，頁86。
- ④⑦ 陳獨秀：〈中日親善〉（1919年3月3日），載《獨秀文存》，下冊，卷二，頁16。
- ④⑧ 陳獨秀：〈亞洲的德意志〉（1919年3月3日），載《獨秀文存》，下冊，卷二，頁18。
- ④⑨ 陳獨秀：〈你護的甚麼法〉（1919年3月3日），載《獨秀文存》，下冊，卷二，頁19。
- ④⑩ 陳獨秀：〈朝鮮獨立運動之感想〉（1919年3月23日），載《獨秀文存》，下冊，卷一，頁608。
- ④⑪ 陳獨秀：〈公同管理〉（1919年5月4日），載《獨秀文存》，下冊，卷二，頁39。
- ④⑫ 陳獨秀：〈梅蘭芳〉（1919年5月4日），載《獨秀文存》，下冊，卷二，頁40。
- ④⑬ 唐寶林、林茂生：《陳獨秀年譜，1879-1942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頁21、24、26、43-44、62、66。
- ④⑭ 李大釗：〈國民之薪膽〉（1915年6月），載《李大釗選集》，頁8。
- ④⑮ 李大釗：〈「晨鐘」之使命（青春中華之創造）〉（1916年8月15日），載《李大釗選集》，頁58、62。
- ④⑯ 李大釗：〈知識階級的勝利〉（1920年2月8日），載《李大釗選集》，頁308。
- ④⑰ 馮建輝：〈建黨初期的陳獨秀〉，載王樹棣等編：《陳獨秀評論選編》，上冊（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頁458。
- ④⑱ 李大釗：〈警告全國父老書〉（1915年8月10日），載《李大釗選集》，頁19、25-26、27。
- ④⑲ 陳獨秀：〈亡國篇〉（1904年7月27日），載任建樹主編：《陳獨秀著作選編》，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頁55。
- ④⑳ 關於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為何具有血緣民族主義性質的問題，筆者另有〈「中華民族」思想與中國「單一民族國家」的發現——近代中日兩國民族主義的「血緣」關係〉一文，未刊。
- ㉑ 陳獨秀：〈說國家〉（1904年6月14日），載《陳獨秀文章選編》，上冊（北京：三聯書店，1984），頁40。
- ㉒ 陳獨秀：〈民主黨與共產黨〉（1920年12月1日），載《獨秀文存》，下冊，卷二，頁110。
- ㉓ 陳獨秀：〈談政治〉（1920年9月1日），載《獨秀文存》，下冊，卷一，頁555。
- ㉔ 陳獨秀：〈政治改造與政黨改造〉（1921年7月1日），載《獨秀文存》，下冊，卷二，頁127。
- ㉕ 參見徐繼良、邱遠猷：〈九十年代以來陳獨秀研究述評〉，《首都師範大學學報》，1999年第1期，頁107-108；張巨浩、林小兵：〈關於陳獨秀實行家長制統治問題的質疑〉，《學術交流》，1996年第5期，頁92；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陳獨秀〉，載《陳獨秀評論選編》，下冊，頁298。
- ㉖ 賴晨：〈從崇拜者到陌路人：毛澤東與陳獨秀關係的演變〉，《紅廣角》，2012年第5期，頁37。